

走出封闭

——陕北妇女的婚姻与生育(1900—1949年)

秦燕 岳珑 著



书馆

陕西人民出版社

前 言

本书是一部地域妇女史研究著作。

近些年来，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国内有关妇女史的研究方兴未艾。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从地域角度探讨各地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特殊性，早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妇女活动在历史记载中十分缺乏，我们在填补这一空白时需注意到妇女生活和活动的地域差异性。换言之，要研究特定地区的妇女活动的历史。它与地域政治史、地域经济史、地域文化史既有区别，又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将地域妇女史研究与总体性妇女史研究结合起来，妇女史才会有更加生动、丰富、具体的内涵。

陕西北部地区三四十年代属于著名的陕甘宁边区，由于它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近些年来已有不少史料和研究著作问世，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研究这一地区妇女史的专著。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本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尝试。

1. 研究的侧重点放在妇女生活方面

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陕北地区历史的史料和研究，主要集中在陕甘宁边区时期。与妇女有关的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只在有些方面偶尔涉及妇女；另一类是妇联系统征集整理的有关当时妇女运动的资料。这些研究和资料基本上是以政治事件、制度为主的“革命史”“运动史”。即使是妇女运动资料，收集的重点也多是领导机关的指示，各级组织的情况汇报、会议等，极少能看到妇女活动的全貌，有关妇女生活的内容更是很少记载。陕甘宁边区时期，陕北妇女

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她们送儿子、丈夫参军参战，送军鞋军粮支援前线，她们积极生产，建设和巩固边区，她们的活动无疑是边区各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特定的陕北地区，广大妇女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陕北的历史文化怎样塑造了这些陕北婆姨？陕甘宁边区建立以后，给当地妇女生活方式带来了哪些变化？思想观念上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影响对妇女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些与过去记载的“革命活动”迥然不同但又非常直接的妇女活动，从未有学者和著作提及。本书从婚姻、生育这两方面与妇女直接相关的内容切入，研究了陕北近代至边区时期婚姻形态和婚姻礼俗的具体内容及其演变；家庭婚姻中的男女两性关系；妇女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的活动和地位；妇女的生育活动和生育观念；边区政权建立以后妇女在婚姻、生育方面发生的变化等等。突破了长期以来单纯以革命史为框架，在研究近现代妇女活动时形成的“革命战争中的革命女人”这一唯一的、固定化的形象和评价模式，展示出妇女史更加生动丰富的内涵。

2. 把妇女的婚姻生育放在陕北地域文化发展演变的大背景下进行描述和分析

历史的发展过程是延续不断的，它尤其表现在社会文化习俗方面。大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一个地区，一种具有独特性的文化特征一经形成，就会以顽强的生命力延续下来。陕北历史上一一直是民族战争和民族融合的前沿地区，地理上又与关中、山西接壤，由于经济、文化上的双重影响，长期以来便形成了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农业文化交合并存的两重性地域文化特征。

从1937年到1949年，陕甘宁边区作为一个独特的行政区划存在了13年。它主要是政治和战争非常状态下的产物，而不是陕北本地政治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所以边区政权的建立并

不意味着陕北妇女生活与以前完全割断了联系，陕北地区原有的传统文化习俗仍然延续和存在，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表现在婚姻生育方面，既有中原正统文化对妇女束缚的一面（如妇女在婚姻、生育中被歧视被支配的地位），又有受北方少数民族习俗影响相对自由开放的一面（如陕北民歌里妇女对爱情热烈大胆的追求和当地习俗对寡妇改嫁的宽容等等）。另外，由于陕北地区的落后和闭塞，当地社会文化传统对于妇女生活的影响和制约，主要表现为从上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毋庸置疑的、必须遵守的各种习俗，可以说，妇女是当地社会传统文化主要的负载者。如当地传统的婚姻、生育观念以及生殖崇拜文化氛围对妇女婚姻、生育行为的影响和制约等等。边区政权建立以后，又出现了外来文化与当地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冲突，如婚姻法颁布对当地传统婚姻习俗和观念的冲击。所以，本书力图在一个较为广阔背景下描述妇女的活动，把妇女的婚姻和生育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动态发展过程，并在陕北地区近代至边区时期一直延续着的社会文化关系中寻找其变化脉络与变化原因，以求更深刻地说明妇女现实处境的社会根源和文化心理根源。

3. 将女性的视角贯穿于整个研究之中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用女性的眼光看历史，同看现实和未来一样，在当今特别具有挑战性和创造力。”^①妇女史与传统的以制度、经济、政治为中心的史学研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强调应将“女性的视角、女性的观点、女性的经验”贯穿于研究之中，也即，当“性别的范畴”被包括时，妇女史应表明它与一般的历史解释有什么不同。本书没有去诠释“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这些既有的概念，而是从妇女生活本身出发，把妇女的经验、经历和两性关系的发展变化作为研究的主要线索。以往关于婚姻方面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婚姻制度和一般的婚姻程序，

而对于作为婚姻主体的人，尤其是妇女本身对婚姻的体会和感受却很少提及。本书对这一方面充分重视，并运用口述史材料尽可能地予以展现。作为“有性的人”，历史上男女两性在婚姻和生育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本书在一些问题上采取了比较的方法，比较了诸如婚姻选择的权利、离婚、生育等方面男女不同的处境和态度，以求在比较中突出妇女本身的特征。边区政权建立以后，大批外地知识妇女进入边区，两种不同层次的妇女由于历史的机遇同处于一个时空之中，是近现代史上非常独特的历史现象，也是极富女性色彩的事件。本书用了相当的篇幅研究了两种层次的妇女各自在婚姻生育方面的活动和观念，特别是她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其中知识女性对两性关系的思考以及所达到的深度，在中国妇女解放的历程上，在女性自我意识发展史上有重要的价值。

4. 在资料的收集和运用上采用了口述史的方法

妇女史首先意味着历史记载中包括妇女。人类的历史是男女两性共同创造的，可是长期以来传统史学所研究和编纂的“人类史”却忽视了妇女的存在，大量的史料记载和研究都是有关男性的，男性的功业、争斗、政治、战争等等，男性被当作历史活动的唯一主体，女性人口占二分之一，其活动在历史中却消失了。无论古代史、近现代史，有关妇女活动的史料和研究都十分匮乏，这一点相信搞妇女史研究的人都深有体会。妇女史的任务就是要把妇女写入历史，以妇女作为研究的主体对象，通过勾稽研究史料，找回妇女的历史，填补妇女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的缺失。本书以为，面对缺失，首先的和重要的是先把它填补起来。在说明它为什么会这样以前，必须先搞清楚它是些什么。本书不像一些大作那样声称采用了诸如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等方法，仍是采用传统史学重资料重描述的方法。所采用的文献资料，主要是清代、民国及建国后三个时期修的

陕北各县县志,陕西省志和陕西省档案馆保存的一些档案资料,同时还参考了其他学者特别是陕北当地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

除以上常规资料外,鉴于妇女生活方面的记载仍然十分贫乏,本书还运用了一部分口述史资料。口述史是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在史学研究方面正在逐渐采取的一种方法,主要是对当事人进行专题采访录音,然后整理成资料。这种方法对补充和订正现有文献记载的不足,特别对了解那些过去被政治史所忽略的有关社会生活和普通人活动的内容有很大的作用。从1993年到1995年,我们进行了三次实地采访,在米脂、延安、安塞、子长、甘泉等地采访了几十位当地不同层次的老年妇女,同时还在西安采访了当年在边区从事各项工作的离休干部。通过对她们的采访,以及对她们的观察,我们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对上一代妇女的生活经历有了更具体、更形象、更深刻的了解,弥补了旧志书等文献资料只讲大的社会制度,忽略具体细节的缺憾。在深入了解女性生活经验,记述妇女个人内心情感方面,口述资料具有文献资料无法比拟的独特价值。经历了20世纪前半期历史的人,如今都已是七八十岁的高龄老人,可以说,这些口述资料的收集和运用,为后人保存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史实。

本课题的研究既是历史的、文化的,同时也是为现实服务的,书中对陕北历史、经济、社会习俗方面的追溯研究,必然有助于今天的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陕北,了解陕北的妇女,促进陕北地区的各项建设事业。

目 录

第一章 传统与现实的衔接	(1)
一、历史及人文概况.....	(1)
二、传统社会中的陕北妇女	(10)
三、新旧交替激烈变化时期的妇女	(13)
第二章 婚姻形态的变留	(21)
一、陕北的传统婚姻	(21)
二、陕北传统婚姻的功能	(31)
三、女子无权选择的婚姻	(32)
四、婚姻类型的演变趋向	(34)
五、新旧婚俗的碰撞、汇流	(39)
第三章 早婚的盛行	(45)
一、“十三上订亲十四上迎”	(45)
二、女子早婚与婚龄结构	(51)
三、早婚与妇女生育健康	(55)
四、对早婚的认识与改进	(62)
第四章 婚姻关系形成步骤及对妇女的禁忌	(67)
一、密切衔接的环节	(67)
二、女子在婚姻关系形成中的角色和地位	(76)
三、婚姻关系建立中有关妇女的禁忌	(81)
四、新式婚仪的兴起	(84)
第五章 从夫居的生活	(88)
一、贫乏的婚前教育	(88)
二、辛勤的劳作	(92)

三、家庭关系	(95)
四、家庭关系的变化和调整	(107)
五、生产致富与“根据地式新家庭”	(113)
第六章 寡妇再婚	(119)
一、对寡妇再婚的宽容	(119)
二、简陋的迎娶	(123)
三、禁忌与再嫁后的伤感	(127)
四、守寡的辛酸	(129)
第七章 婚姻观念的演变	(133)
一、婚姻观念的二重变奏	(133)
二、婚姻自由的启蒙	(139)
三、离婚自由	(146)
四、两种观念的冲突	(154)
第八章 内在的生殖冲动	(163)
一、强烈的生殖愿望	(163)
二、生育神与源远流长的祈子	(166)
三、性别价值取向——重生男不嫌女	(170)
四、妇女艺术活动中的生殖崇拜	(171)
五、边区鼓励人口生产的政策	(176)
第九章 生育前后与新法接生的普及	(179)
一、生育文化的延续和传承	(180)
二、陕北妇女生育的特点	(187)
三、助产教育的发轫	(189)
四、新法接生与旧法接生之比较	(191)
五、新法接生的宣传和普及	(195)
第十章 新女性的婚姻和生育	(206)
一、革命加浪漫的婚姻模式	(207)
二、新女性的尴尬	(212)

三、不合格的母亲.....	(217)
四、新女性的思考.....	(225)
结 语.....	(230)
主要参考文献.....	(232)
后 记.....	(235)

第一章 传统与现实的衔接

一、历史及人文概况

陕北地区先秦时期属古雍州。《尚书·禹贡》云：“黑水西河惟雍州。”《尔雅·释地》云：“河西曰雍州。”据专家考证，西河或河是指今陕西与山西之间的黄河。^①据《延安府志》记载，“禹贡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轩辕黄帝在今延安地区的黄陵县建立了桥国，治水英雄大禹在延安的宜川县劈开孟门山，形成了黄河壶口瀑布。从这些传说可以想见，上古时期延安以及整个陕北地区是十分发达的。周朝建立后，周人与曾是同一祖先的陕北当地土著发生了战争，称其为“獫狁”。《诗经》中就一再咏叹：“靡室靡家，獫狁之故。不遑启居，獫狁之故。”“獫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后经战国纷争，秦统一全国，整个陕北正式归入秦朝版图，被设为“上郡”，并于安塞设高奴县。

秦汉时期，陕北成为拱卫京师的重要屏障，中原王朝在这里大力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陕北许多地方田畴四布，人口繁盛。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这期间陕北大地上战火蜂起，延安就是匈奴、突厥进攻关中的边

^① 杨东晨：《先秦时期陕北民族迁徙和融合》，载《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陝要地，匈奴族首领赫连勃勃在靖边建立国都，名曰统万城，国号“大夏”。以后西夏又陆续设立延川县、延长县、甘泉县、洛川县。

唐末到宋代，陕北是西夏国与中原王朝长期混战拉锯的地带。党项羌族成为中原王朝的劲敌，占有了靖边、米脂、绥德等县，延安成为北方第一军事重镇。北宋后来派往延安的守边大吏，几乎都挂有陕西经略副使的官衔，范仲淹、韩琦、沈括等先后被派至此地。现延安市嘉岭山就有范仲淹当年的遗墨。西夏国与北宋对峙了100余年，战火也在陕北大地上燃烧了100多年，先是宋、金、夏争夺延安，以后是蒙古族争夺延安。

从元统一到明末以前，陕北地区相对平静。明末，农民大起义在陕北大地上爆发了，米脂县的李自成、安塞县的高迎祥、定边县的张献忠、保安县的神一元、洛川县的李老柴、延川县的王自用、子洲县的不沾泥等揭竿而起，南征北战，直至推翻明王朝。清代同治六年（1867）西北地区回民大起义，一个时期，起义军长驱直入，几乎占领了整个陕北大地。战火所及之处，死伤无数。尤其是甘泉县经这次浩劫之后，西南部田园完全荒芜，形成了一大片森林。

从先秦到宋代，陕北当地的生产方式经历了农牧业的消长反复，明代以后，由于大批移民和屯垦，逐渐以农业为主，但长城沿线地区还有畜牧业。历代政府推行的大规模的垦荒，造成了陕北地区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片森林消失，水土流失，再加上天灾人祸，到了清末民国初年，陕北成了中国大地上经济最落后的区域之一。

进入近代，一些沿海地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社会阶层加剧分化，城镇不少人口从事商业和进入工厂做工。二三十年代，职业性妇女也在上海等城市出现。而内地的变化却显

得十分迟缓，绝大部分人口仍然属于农业人口。据民国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4年出版的陕西省农村调查资料反映，农业劳动力外流比例一般低于10%。1938年绥德县为4.1%（26人），外出劳动力多入晋、豫、甘为雇工，进工厂做工的几乎没有。^①如府谷县：“府民不善治生，惟业农亩，不事商贾。”葭州：“州地瘠薄，除务农外别无生计。”乡间的读书人也多务农，“民咸尽心农事，读书者也作苦田间。”城镇人口也有很大一部分兼及农业，“不独居乡之人皆务农业，即城市居民亦间资耕作。”^②

从事商业的人寥寥无几，“城乡贸易皆同州、朝邑、韩城及山西人居多，县人入伙生理者，十不过一二，客民肩货至乡，以布易粮，春放秋收。”^③

手工业也极不发达，“百工营造甚为粗略，从无奇技，何虑淫巧。”^④本世纪20年代前，各县除了有一些小规模的手工作坊外，还谈不上近代工业制造。即使是陕北南部靠近关中的洛川县，民国初年也不过仅有几家裁缝铺、砖瓦窑和酿酒、榨油、木器制作的作坊。^⑤

由于山多坡陡，陕北的交通极不发达，一般农户平时忙于劳作，很少出门，偶尔探亲访友，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小毛驴。“逢集驱驴驮粮上市易钱”，“往来戚里，率骑驴。”^⑥当地地理环境闭塞，北靠毛乌素沙漠，境内山峦起伏，沟沟坎坎，交通极

① 转引自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1页。

② 光绪《绥德直隶州志》卷4。

③ 道光《保安县志·习俗》。

④ 嘉庆《葭州志》卷1。

⑤ 民国《洛川县志·工商志》。

⑥ 嘉庆《延安府志》卷39。

其不便。明清时当地官员感叹“千里顽山，四周重阻，商贾难以至其地，行旅难以出其力”，“山径仄险，舟车均阻”。到了近代，这种状况也没有多大改变。因转运艰难，交通不便，所以陕北的商业也不发达，在明代以前，与内蒙古的边地贸易形成一定规模，但带有明显的“转埠”性质，本地的产品绝少参加贸易，对陕北本地的经济发展刺激是非常微弱的。直到近代“陕北各县无商埠可言”，许多日用品都要从外省输入。“丝绸棉布购自太原，号为东路，纸张与药来自关中，率春贷秋给，夏赙冬还，资无巨万之家，利仅蝇头之微。”^①神木县“除盐碱皮货而外并无出产，一切花布绸缎及日用之物俱仰给他省”。用盐碱到蒙地换取布匹茶烟。“赴远省贸易只有皮货一行，然亦寥寥无几人耳”。^②

各县仅在县城和一些大的镇子有规模不大的集市贸易。“邑多肩挑负贩游商，便于集会贸易；其坐肆而设贾者，仅有县城……而资金甚微，门庄冷落。”^③“县境北不至归绥，东不近黄河，交通不便，转运维艰。经商者只务负贩居积，不思牵车牛远服贾，以故城市乡镇设肆县牌者不及百家。”^④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秦汉以后历代人民虽胼手胝足，但生存环境却十分恶劣。如甘泉县：“境内皆群山环叠，可耕地百无一二，居民零落，气候寒多暖少，最可虑者，黑霜夏秋为害，四月霜侵嫩苗尽萎，八月霜霏，收皆秕粟，即丰年亦不过腹地之半稔，一遇歉收，即成饥馑，良由户鲜盖藏家无殷实，是以困苦之况日形其甚。”^⑤米脂：“县境山多土松，车轨弗行，刀耕火

① 民国《米脂县志》卷4。

② 道光《神木县志》卷2。

③ 民国《洛川县志·工商志》。

④ 民国《米脂县志》卷4。

⑤ 《甘泉乡土志·实业地理》。

种人力难施。五日雨则低田涝，十日晴则坡地旱，山川险阻，沃野平畴不过千百之一，丰年犹鲜盖藏，一遇凶岁，不免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①神木：“其气少热而多寒，谷雨后土脉始融，白露前早霜已陨，且一当炎夏雨泽恒稀，每获甘霖，雹电交作，故农事在在堪虞。”^②

陕北自然灾害频繁，可谓十年九灾，其中又以旱、雹、霜灾为最甚。据《陕西通志》《延安府志》《延绥镇志》等记载，清末民初，陕北几乎连年旱灾，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入夏以来，雨泽愆期，春收仅一二分，并有全无收获者，入夏亢旱尤甚。”民国17年（1928）“自春及夏，井泉涸渴，多年老树大半枯萎，夏粮收成不到二成，秋季颗粒未登。粮价昂贵，人民无钱买粮，其它树皮草根采掘已尽，赤野千里，不忍目睹，举村逃亡者不一而足。”

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和经济的落后，陕北人民长期以来处于极端困苦的状态。“民俗纯朴，用度节俭，千金之家鲜纨绔，百金之家无绡帛。”“地近边隅，寒多暖少，鲜膏腴之野，又无水利之饶，以故人多贫窘。”辛亥革命前夕，榆林道台杨卓林奉命赴任，一路上所经之处，看到“人多菜色，地尽不毛，一片荒寒，万家困苦，睹此鹄面鸠形之众，蹙焉心伤。”^③“农人春耕秋获，三时皆勤苦，相习至冬稍暇，以粪种奔走田间，故谓终岁勤动也。今农人自称‘受苦人’，人称之为亦‘受苦人’，信然。”^④

由于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陕北平均人口寿命只有 35

① 民国《米脂县志》卷6。

② 道光《神木县志》卷2。

③ 转引自姬乃军：《黄土魂——陕北民歌纵横谈》，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

④ 《续陕西通志稿》卷196。

岁。^①

陕北历史悠久，有其深厚的文化传统，据专家们研究，陕北历史上曾出现过三个文化高潮。第一个是以仰韶文化和庙底沟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高潮，洛川县的人首蛇身、狮身人首、鱼身人面以及鹰身狮首人面等等图腾文化剪纸，正是这一时代艺术的遗存。第二个是以东汉画像砖为代表的汉代文化高潮。第三个是以北宋石窟艺术为代表的宋代文化高潮。宋以后到明清，由于天灾人祸和长期的战争，对当地文化造成极大的破坏，“边地百战后，诗书封尘土。不知孔子殿，何时经颓腐。”^②

由于地理环境闭塞和经济的长期落后，导致了文化再发展和传播的极端困难。从西安到榆林，有1300里山路，即使以马代步也需半月到20天，真可谓“山高皇帝远”。文化的传播在现代通信技术发明之前基本上是靠文字书籍，文字书籍的流传又必须借助于读书人，陕北当地读书人数量十分有限。不要说偏僻的乡村，就是县城及大一些的乡镇，也没有多少人能够上学识字。所以旧县志里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土瘠民贫，读书识字者盖少，其故多苦家寒无力入学，往往以聪颖子弟畜牧务农终其身。”“县民读书知礼者素寡，独于修葺庙宇迎佛赛会反踊跃争先。”^③县民“性朴少文，质任自然。”^④生活的窘迫使得本来就极少的读书人又很难成就学业，“诵读之士颇有俊才，惜多寒俭，往往急于谋生，其功中辍。”^⑤1936年，陕北地区普

① 《府谷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

② 道光《榆林府志·艺文志》。

③ 民国《横山县志》卷3。

④ 道光《重修延川县志》卷2。

⑤ 道光《神木县志》卷2。

通人民识字者不到1%。12500人才有一所小学。^①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文盲。

陕北没有像关中或南方那样非常发达和组织森严的封建大家族。明清以前因无文献可考无从知晓当地宗族的详细情况,从明清以后各县县志的记载来考查,各地宗族势力并不很强。宗族发展首先的条件是必须有较好的经济基础,较好的自然环境和耕作条件适合聚族而居,能够较稳定地维持众多人口基本的生活。其次是社会生活相对安定,较少动荡。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可能形成世代绵延的大家族。而从陕北历史上来看,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这一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地瘠民贫的现实状况使本来就稀少的人口不得不分散居住。“群山环叠,可耕之地百无二三,居民零落,或十数里一村庄,间有因荒山阻隔五六十里一村庄者。”^②一直受到频繁的战乱和自然灾害的侵扰,人口不稳定也就不容易形成世代绵延的大家族。如甘泉县,“本境户口经同治六年先以兵荒继以疾疫终以野狼伤人,于是逃亡者过半,后复经光绪三年奇旱,二十六年饥馑而逃散死伤者又去十之七八。”“本境无大姓氏族。”^③《保安县志》:“盖县俗,家无族谱,族无宗祠,绅士家方许设主,庶民不与焉。各姓坟地复无志碑墓表,不数传,子孙竟有忘其祖父者。矧自乱离以来,耆老代谢,其子弟无祖宗邱墓之可守,无旧德先畴之难忘,稍有变乱辄轻去其乡,视里闾若传舍,无惑乎户口之日以凋零也。”靖边县“竟不修神主,坟不择地,各就左近荒山葬之,……惟不修围墙,不树碑碣,蔓草宿烟,转瞬即不知为谁何”。^④陕北

① 刘锡成:《陕甘宁边区新文化教育事业简论》,载《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

② 《甘泉乡土志·实业地理》。

③ 《甘泉乡土志·实业地理》。

④ 光绪《靖边县志》卷1《风俗志》。

各县为数不多的大家族中，有宗祠、宗谱，并且有一定规模和固定宗族活动的更寥寥无几（这主要指民国建立以前的情况）。正因为家族势力不十分强大，传统社会用宗法道德规范民众行为的力量必然就显得薄弱。“盖礼义生于富足，邑贫寒之家多，士大夫家少族祠亦经费无几，不足守礼”。^①

陕北历史上是中原农业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接合处。长期边地战争以及民族杂居和民族融合的历史给当地打下了很深的印记。姓氏里有呼、延、党、尉等，这些都是从少数民族的复姓如呼延、慕容、尉迟演变过来的。府谷县有名的折氏，先世即源出党项族，绵延数代以后，成为地方上的一大族。地名上如府谷县的新民乡原名镇羌堡；大昌汉乡的大昌汉，蒙语意思是寨子；庙沟门乡的哈达沟，蒙语为“石头”“岩峰”。^② 社会风习上更是受到少数民族较多的影响，这在历代史书中均有记载。《汉书·地理志》：“安定北地西河上郡迫近戎翟，修习战备，高尚气力，以射猎为先。”《隋书·地理志》：“接近山戎，性多木疆。”《唐书·地理志》：“地接边荒，多尚武节，亦习俗使然。”宋代《方輿攬胜》：“地近边陲，俗尚强悍。”

正是由于地理闭塞以及民族融合、文化传播困难、宗族势力不强等原因，陕北地区正统教化的功能一直显得比较薄弱，社会习俗中一些行为方式和观念与关中等地相比有较大的区别。如清末民初，陕北地区养子之风很盛，延川县“又多螟蛉子，无论本户外姓他县别省，率鬻负之，俗曰抱一子，即有子者亦买畜不惜，长或背恩逃归，生识不则，本生父母兄弟骚扰，粮债累赔，其谊如所生殷劳侍老者，十不过一二。嗟乎，属毛离里，

^① 民国《米脂县志》卷4。

^② 《府谷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9页。